

SIMILAR YET DIFFERENT:
CASE STUDIES OF CHINA'S MODERN
CHRISTIAN COLLEGES

异同之间：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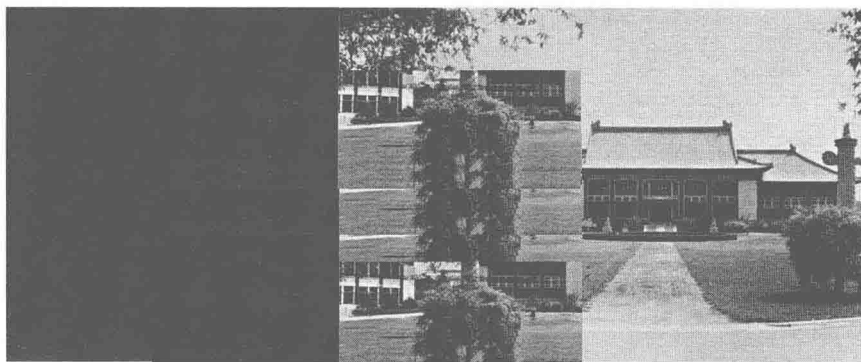
[美]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陈红民 主编



SIMILAR YET DIFFERENT:
CASE STUDIES OF CHINA'S MODERN
CHRISTIAN COLLEGES

异同之间：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

[美]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陈红民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 / (美)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陈红民主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213-09233-6

I. ①异… II. ①裴… ②陈… III. ①教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4989 号

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

[美]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陈红民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汪 芳 吴玲霞

责任校对 杨 帆

责任印务 程 琳

封面设计 大漠照排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7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9233-6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言一

裴宜理

当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建议共同组织一次关于民国教会大学的研讨会时,我感到不胜荣幸。虽然据我所知,蒋介石本人与教会大学并无密切联系,但蒋家诸多显赫人士与这些大学颇有渊源。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部长(后任行政院长)孔祥熙曾多年担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而他的妻弟、财政部和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则是圣约翰大学的活跃校友。作为一名对民国政治史兴趣颇深的学者,关于教会大学的学术讨论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我对于研讨会的兴趣也缘于个人背景。我的父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圣玛利亚女中从教近 20 年,我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就是在美丽的圣约翰校区内度过的。1949 年,我们举家先迁回国,两年之后辗转到日本,我在东京立教大学(St. Paul's University)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所圣公会大学曾是圣约翰大学的姐妹院校。时至今日,我在日本的避暑别墅中依然悬挂着一张圣约翰校园的照片。老照片记录着昔日校园里整齐高大的樟树,默默讲述着中国教育史上定格的那一瞬间。

我认为,重新审视民国教会大学不仅是出于怀旧,还因为它们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鉴于当今中国面临的教育改革,这种历史反思具有紧迫的当下性。教会大学史提醒我们,中国高等教育所追求的国际标准和民族特色是贯穿现代中国的主题。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也曾为实现国际知名度和保持中国特色而不断探索。五四运动不仅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兴趣,其对国学的

关注也促成了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思虑。

中国第一个国学中心于1922年由胡适在北京大学创立。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该运动试图以反思中国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西方的挑战。作为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学生，胡适把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当作民族复兴的关键。两年后，南京的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开设了类似的国学中心。1925年，清华学校（用美国的“庚子赔款”退还款兴办）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旨在将中国学术和英美大学体制融为一体。随后不久，北平和南京的几所主要公立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研究，试图用世界主义的眼光，以现代化为光谱，批判性地审视中国文化。

然而，这些公立大学立足于中国文明来追求世界级教育的尝试并非独一无二。民国教会大学也为国学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尽管它们后来被斥责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这些大学所开创的全球化教育的重要实践依然值得我们重视。诚然，教会大学的主要使命是传播福音，然而这些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是以中西传统并举的方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作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媒介，民国时期的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和3所天主教大学都在努力付诸本土化实践。引人注目的校园建筑结合了东西方建筑特征，这种空间美学象征着融合中西的尝试。教会大学的这种本土化驱动力不仅体现在校园的外观上，也体现在学术管理和课程设置的诸多方面。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下，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大多数教会大学都任命了新的中国校长，以取代外国传教士校长，并取消了强制性的礼拜活动和宗教必修课。同时，“三民主义”和“党义”教育以政治课的形式出现在课堂。不仅如此，为了顺应风靡全国的国学热，许多教会大学开设了中国研究的学习项目，旨在淡化其洋办色彩。这里面最杰出的领航者——北平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甚至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一直以严格的美式教育著称）——纷纷尝试将严谨的西式教育与中国文史哲研究相结合，并聘请了声名卓著的中国学者到校任教。

早在1928—1929年，成立不到10年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已经声名卓

著,它能开出 50 门课程,而其中的一半是中国历史研究。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历史课程的数量和精细程度都在增长。此外,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学科(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也在提供各种以中国为重点的课程。燕京大学之所以于 1928 年开设国学研究所,显然是受到中国顶尖公立大学不断推广国学研究的影响。然而,燕京大学此举并非完全是迫于国内的压力,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为其提供了学术的国际视野。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总部设在哈佛大学校园内的独立基金会,根据 1928 年的章程,它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发展、支持、维护和(或)开展多项教育项目,来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出版”。

在五四运动兴起不到 10 年,爱国学生呼吁以西方“科学”和“民主”来谋求民族富强和对抗外国列强之际,哈佛燕京学社希望以推动关于中国文明的创新研究之道来使中国和西方受益。这一全球性的努力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支撑,燕京大学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主要基地。

燕京大学能被选中,作为这项跨国事业的中国合作伙伴,首先要归功于其富有远见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是最早意识到要将中国研究纳入西学课程的外国教育家之一。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注入大量的资金(其资金完全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燕京大学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能够从那些经费不那么宽裕的公立大学聘用一批顶尖的学者。不久,燕大就拥有了一批声名显赫的教师,其中包括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历史学家顾颉刚、陈垣和钱穆等。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与燕大人文学学院院长洪业(William Hung)的积极领导相得益彰,使燕京大学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研究重镇。由洪业主导多年的位于燕大校园内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成为汉学研究和出版的中心,为课堂教学和图书馆发展带来了诸多便利。

在洪业的指导下,燕京大学寻求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既有的学术体制。洪业没有单独创立一所国学院,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研究融入已有的科系。作为一位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洪业坚持认为中国研究应该由具有“现代学术素养”的学者进行,他们精通外语并且熟悉中国以外的学术世界。

洪业的多数弟子系燕大毕业生,并且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这些

学者成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处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个系列则成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这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系统地编纂了中国古典词汇索引，并辅以关键词、事件、时间、地点等信息。这项工程比计算机化的数据库早了好几十年，旨在让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现代学者能够便利地获取古代经典。

燕京大学的教育工作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的广泛认可。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国14所一流私立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专项考试，两名来自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了最高分。加州大学同年开展的一项国际评估，将燕大评为亚洲两所最佳大学之一，这使得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得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在洪业的领导下，燕大的整体学术成就为最前沿的中国研究提供了范例。1937年，洪业本人因其在汉学引得中的贡献，被法兰西文学院授予声名卓著的“儒莲奖”。

燕大研究项目的卓越性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教育部于1936—1938年对13所国立大学、9所省立大学和20所私立大学进行了人文科学研究项目的全面评估，燕京大学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居于第三、第四位）。燕大能够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超越41所中国院校，主要是得益于洪业能够充分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具有吸引力的薪水和奖学金，吸引杰出的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和学生。

燕大并非唯一一所获得卓越声誉的中国教会大学。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扶持，其他教会大学也开始发展严肃的中国研究，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也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定期年度拨款，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些资金用于招聘教师，丰富图书馆和博物馆藏品，进行考古探险和其他集体或个人研究工作，并在中国研究领域出版教科书和专业期刊。一些最初没有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基督教学院，如华中大学，后来也得到了专项汉学项目资助。

燕京大学拥有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中国研究项目，其他教会大学则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汉学研究。以农学院闻名遐迩的金陵大学，利用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图书馆，收藏了一系列珍贵的地方志。除了增加中国研究的本

科课程外,金陵大学还编纂了中国地理研究目录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齐鲁大学则将其研究方向聚焦在齐鲁文化史上,特别是通过发掘碑刻来考察儒家经本。哈佛燕京学社所存的工资单显示,著名作家老舍曾驻校教授中国文学4年。福建协和大学专注于福建省的民俗、民间艺术和音乐,并提供了关于地域史和当地文学的丰富课程。不仅如此,该校学者还组织了一次探访南宋理学家朱熹出生地的学术考察。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在福建被赞誉为“支持学术本土化的有力举措”。广州岭南大学为南洋华侨学生量身定制了中国研究课程,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主要用于为有志“寻根”的海外华侨提供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和文化史课程。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设立了一个考古博物馆,用于展示原始部落和汉文化的遗迹。

这些卓有成效的学术项目表明,哈佛燕京学社无疑是推动包括燕大在内的一些美国教会大学中国化的重要力量。但是,哈佛燕京学社并非促进学术本土化的唯一动力,没有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教会大学也为发展中国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被中国各界视作是将“美式教育”奉为圭臬的教会大学。1922年,圣约翰召集了一个由著名教育改革者黄炎培主持的委员会,就如何加强该校的中国研究课程提出议案,以应对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为响应这些提案,圣约翰聘请了孟宪承(1894—1967)——一位毕业于圣约翰、在英美进修教育研究,并以其创新的教学理念享誉学界的教育家。在孟宪承的努力下,1923年的新课程大纲规定,所有圣约翰大学学生必须完成大量中国语言及文学课程才可以获得学位。虽然两年后孟宪承和他的许多中国同事为表达他们对五卅爱国运动的支持而离开了圣约翰大学,但校方随即聘请了更多的中国文史教授来取代他们。根据1933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圣约翰中学和大学提供的中国文学训练时间比全国其他任何机构都长。毫无疑问,圣约翰校友中熟稔中西文化之道的知识分子数不胜数,张爱玲、邹韬奋、林语堂和贝聿铭等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能够为当今寻求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者提供哪些经验教训呢?多样性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每一所教会大学都能够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既有的教学资源来发展极富

原创性的本土化路径。得益于此，19 所基督教大学都得以发展各具特色的课程大纲和课外活动，为各自的校园文化营造了独特的氛围。

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其内部多样性而著称。例如，当代美国的教育版图不仅仅为私立常春藤大学所独占，公立研究型大学、小型文科学院、理工型大学、军事院校、宗教学院和社区学院也有其独具一格的特色，学生可以根据自身资质和兴趣来挑选最合适的教育机构。此外，由于转学的普遍存在，学生能够从多种教育理念和设计中获益良多。

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日益加速的当下，决策者不仅需要关注英美顶尖大学的经验，也应当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汲取灵感，而儒家的书院和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动态的历史版图中，民国教会大学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更早一些的学术研究中，教会大学的活动往往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新的学术研究表明，教会大学的诸多尝试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不同的典范。

本书探讨了民国教会大学异彩纷呈的多样性。有些论文侧重于重构民国高校的前沿学术动态，如华中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在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中进行的人种学调查；有些论文考察了特定的学术科系，如燕京大学和之江大学的文学系；有些论文则力图还原与教会大学息息相关的中外名人的活动，如圣约翰毕业生宋子文和金陵大学的贝德士（Searle Bates）；其余论文则探讨了不同学院的独特起源、课程演化和校园文化等。

这些论文首先在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于 2017 年秋季联合举办的“同质与差异：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发表，研讨会的举办地址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恰好是曾经的之江大学的校园。作为会议的共同举办方，哈佛燕京学社非常感谢陈红民教授和浙大同事以及学生的专业指导和热情款待，我们也感谢所有论文的作者对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研究所作出的富于洞见的论述。

（裴宜理，哈佛大学政治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译者：涂航，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候选人）



序言二

陈红民

呈现在各位面前的，是2017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和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同质与差异：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论坛的论文集。

作为会议的策划者与主办者之一，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会议的初衷、组织筹备情况与议程，以使读者了解会议的基本情况，从而加深对每篇论文的理解，体认此次会议在教会大学研究史上的地位。

2013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和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功地合办过“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学术论坛。当时，12位与哈佛燕京学社有着学缘的学者从美国、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各地会聚杭城，在秋雨濛濛中泛舟西湖，纵论学术，印象深刻。论坛的成果最后以论文集《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出版了。

论坛结束时，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我与裴宜理社长商议，可以再找个合适的议题，继续合作办会。找什么议题呢？那次论坛的前夕，裴宜理教授在浙江大学做了一场关于教会大学历史的学术讲座，引起校园轰动。当晚，因听众太多，不得不临时更换场地。所以，我就提议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主题。这个想法得到了燕京学社的积极回应。

其实，燕京学社和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合办教会大学史的学术会议，并非全是突发奇想，还真其来有自，各有渊源，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众所周知，燕京学社曾长期支持中国的教会大学，而浙江大学的一个源流是教会学校的之江大学。裴宜理教授出生

于上海，她的父亲曾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本人与浙大蒋研中心并不研究教会大学史，目前也无史料显示蒋介石与教会大学有多少直接关系，但蒋介石信基督教，关心高等教育，宋美龄曾任台湾辅仁大学的董事长，辅仁大学内有知名的“中美堂”建筑，蒋、宋家族中的宋子文、孔祥熙都与教会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近年来，“双一流”成为中国的一个热词，各高校都在争创“双一流”。中国大学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又有人拿历史上的教会大学说事，说教会大学就是消失了的曾经的“世界一流大学”。一不小心，我们的学术会议还真赶了潮流。

近年来，教会大学史一直是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学术热点，有许多的成果。我们的会议如何开出新意，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与裴宜理教授商量时提出，过往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将教会大学作为一个群体，以中国人自办大学作为参照，强调教会大学与中国人自办大学的异同。其实，教会大学本身千差万别，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可能比它们与中国人自办大学间的差别还大。我们将会议的关注焦点确定在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希望从经费、学生来源与校园生活、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所在地政府的关系、主事者的办校经历诸方面，彰显其异同，以期将教会大学的研究引向更细致、更深入的层面。在此主题下，开一个规模小而精致的学术会议，希望原有的十多所教会大学都有论文专门讨论，希望与会者既有资深学者，也有青年才俊，既保证学术质量，又推进研究队伍的建设。这些初衷得到裴宜理教授的充分肯定，她推荐马敏、刘家峰等几位在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参加会议。

在给与会者的邀请函中，我们写了会议的主旨与议题：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以鲜明的办学特色和较高的办学质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效地参与、促进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社会文化转型，推动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脚步。目前，学术界从整体视角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展开系统研究，成果丰硕，但从内在理路考察中国各教会大学办学的独特性、比较各教会大学之间的共性与差别方面，仍有较大拓展的空间。

有鉴于此，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和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

中国研究中心拟于2017年9月下旬在杭州联合主办“同质与差异：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论坛。论坛将主要以各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以下议题：

- (1) 各教会大学的渊源、发展脉络与历史沿革；
- (2) 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计与师生流动；
- (3) 中国教会大学与地方社会；
- (4) 中国教会大学与学术，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课程设计与研究；
- (5)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记忆；
- (6) 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017年9月28日，“同质与差异：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论坛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召开。史学研究难免枯燥与孤寂，但我们选了个有意境与情怀的地方开会。之江校区是原教会学校——之江大学的旧址，因保持着民国旧貌，风景秀美，是几部电影的外景地与青年人拍婚纱照的热门地方。在此地研讨教会大学史，会有特殊的灵感，也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20多位来自各地的学者参加学术论坛，提供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论文几乎涵盖近代以来所有的中国教会大学，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辅仁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华中大学、沪江大学、津沽大学等，内容涉及教会大学的学校人事、经费、师资、校园生活、教会大学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等。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与副社长李若虹博士不远万里从美国飞来与会，裴宜理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了研究教会大学的意义与价值，令会议增色不少。

为使读者了解会议的议程，有现场感，特将会议议程列于下：

开幕式

地 点：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会议室

主办单位代表陈红民教授报告会议缘起与筹备

嘉宾致辞：裴宜理（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第一场 论文报告

主持人：吴景平（复旦大学）

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及课程设置》

颜 芳（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试析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课程变革》

张 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文系与民国学界的国学研究》

第二场 论文报告

主持人：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

吴景平（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学生的互动：以宋子文为中心》

吴义雄（中山大学）：《体制传承与个性塑造：立案前后岭南大学的探索之路》

张 生（南京大学）：《贝德士：金陵大学的中坚》

第三场 论文报告

主持人：吴义雄（中山大学）

刘家峰（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与城市发展》

李晓晨（青岛科技大学）：《津沽大学与献县天主教区的渊源及其历史沿革》

陈 远（独立学者）：《燕大成立之初的校名风波以及教会在华教育布局》

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家庭”的话语与实践：金陵女大的家庭认同研究》

第四场 论文报告

主持人：刘家峰（山东大学）

孙邦华（北京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学科发展史论》

刘 贤（中国人民大学）：《辅仁大学司铎学院初探》

韩 成（上海大学）：《教会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分合：以沪江大学政治学科和历史学科为中心》

龙 伟（重庆大学）：《亚洲腹地的探险：华西协合大学与近代

西南边疆的知识生成》

综合讨论

主持人：李若虹（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会上，学者对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互相质疑切磋。会后，学者们又修正润色，有些论文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我以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掘”教会大学，使那些被湮灭的大学重新进入学者与公众的视野，不再有意无意地掩埋它们；第二阶段是“正名”教会大学，评价其是非，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的全盘否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肯定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体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诸方面对中国的积极意义；第三阶段是“平视”教会大学，开始接纳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或许是特殊的，但是有机的一部分，不再用非学术的道德与价值判断来指导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同质与差异：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论坛的举行，就是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成果，着重在比较教会大学之间的各种异同，相信是可以写入中国教会大学研究学术史的。

裴宜理教授在开幕式上提示，应该注意中外教会大学的比较研究，作为起步，可以先从东亚地区的教会大学比较开始。这或许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此次学术论坛得到各方的帮助：哈佛燕京学社提供了足够的经费，杭州文史研究会协办论坛，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提供了场地与会务服务，浙大蒋研中心的师生做了大量服务工作。在此，向所有为论坛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单位与人士致谢！

（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抗日战争期间华中大学的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研究 ——兼论大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马 敏 吴和林 1
西南边疆的探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西南边疆的知识生产 ·····	龙 伟 周蜀蓉 27
融入体制与秉持特性:立案以后岭南大学的发展之路 ·····	吴义雄 47
圣约翰大学与学生的互动 ——以宋子文为中心 ·····	吴景平 66
从历史学家到历史亲历者:贝德士传略·····	张 生 81
学术传教:本土与罗马 ——北京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初探·····	刘 贤 134
校园政治与中西博弈:齐鲁大学立案前后的易长风波 ·····	刘家峰 160
津沽大学与献县天主教区的渊源及其历史沿革·····	李晓晨 178
燕京大学成立之前的校名风波以及教会在华的教育布局 ·····	陈 远 196

“金陵家庭”的话语和实践：金陵女子大学的家庭认同研究	严海建 210
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科发展史论.....	孙邦华 228
教会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分合 ——以沪江大学政治学科及历史学科为中心.....	韩 戍 259
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课程变革.....	颜 芳 273
之江大学国文系与民国学界的国学研究.....	张 凯 289
结 语.....	李若虹 317



抗日战争期间华中大学的西南 边疆民族文化研究

——兼论大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马 敏 吴和林



【内容摘要】 抗日战争期间，华中大学辗转桂林，西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和开展科学研究。西迁期间，华中大学在哈佛燕京学社和当地社会的支持下，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和社会等实际情况，开展了有关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以及语言、文化研究，培养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及服务云南地方的高层次人才，促进了当地的教育、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与发展，谱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高校与地方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 华中大学 西南地区 边疆研究 文化互动

抗日战争期间，与当时诸多高校一样，为躲避战乱，华中大学背井离乡，经桂林西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在喜洲8年期间，华中大学师生投身云南大理和喜洲的建设之中，不仅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也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社会等进行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于许多过去不太引人关注或始终没有弄清楚的民族、语言、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问题，华中大学人文学者高度重视，并发表了一系列享誉中外的优秀学术成果。尤其是其间发生的内地与边疆、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大学与小镇社会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今日之学